

從措詞明理藝術的角度 來研究《鶡冠子》

[比利時] 戴卡琳(Carine Defoort)

我 1988 年到了夏威夷大學纔發現有《鶡冠子》這麼一本古書。那時候夏威夷大學不但有幾個人研究周末漢初的古籍，比如《黃老帛書》、《呂氏春秋》、《淮南子》，而且剛好也有葛瑞漢(Angus Graham)教授在那邊當客座教授。他對於《鶡冠子》下了不少的工夫研究。我在這個環境裏開始研究鶡冠子，1993 年把博士論文寫完了，1996 年把書出版。書名叫：“The Pheasant Cap Master: a Rhetorical Reading.”陳鼓應教授給我這個機會來簡單地介紹這本書的內容和研究方法^①。

書名最令人詫異的大概是“Rhetorical”這個詞。這個英文詞雖然中文一般譯為“修辭學”，可是在本書裏“Rhetoric”根本不是這個意思。因為“*The Pheasant Cap Master*”代表書的內容，而“Rhetoric”代表研究方法，所以我先簡單的解釋一下這個詞的用法。在西方傳統裏“Rhetoric”有很多不同的意思，起碼可以分為三種。亞里士多德在他關於這個題目所寫的書裏已經把它分為兩個意思。最基本的意思是每個人的言論所具有的說服力量；第二個意思是亞里士多德自己想提倡的一種技術，就是研究和分析說服

^① 因為這篇文章主要是為了簡單地介紹我的書而不是為了解釋《鶡冠子》，所以注解不多。關於《鶡冠子》的中文文章已經有十幾篇。在《道家文化研究》第一輯裏有李學勤《〈鶡冠子〉與兩種帛書》，第六輯裏有邢文《〈鶡冠子〉與帛書〈要〉》。

力量的特點和作用。這就是“*téchne rhetoriké*”或者“*ars rhetorica*”^①。這是 Rhetoric 第二個重要的意思。中文的“修辭學”這個詞是從這個意思譯過來的。

第三個意思是一種很重視語言力量的思想派別的主張。這個思想派別在西方傳統裏從古希臘以來一直是“哲學思想派別”的對立面。西方哲學家從柏拉圖以來很懷疑語言的力量。他們因為相信客觀不變的真理的存在，所以最怕這個真理會受到主觀的語言的紛擾。按照他們的看法，語言如果對真理不是一種威脅的話，它祇能給它一種服務而已。即：把客觀的真理美麗地表達出來，讓人家注意它。“措詞明理派”懷疑客觀真理的存在：他們認為任何言論，包括哲學理論，都是從一個主觀的角度出發，在一個具體的範圍裏提出的。語言對於真理的影響是必要而不能避免的。雖然真理會受到語言的紛擾，可是它也靠語言而存在。這兩個思想派別對於任何問題，包括互相價值的評斷，都有很不同的看法^②。因為在西方傳統裏“哲學派別”最強大，所以它對於西方文化各個方面的影響都很大，譬如科學、宗教、語言和漢學(Sinology)。中國人把“Rhetoric”僅看做一種“修辭學”(第二個意思)這也反映了西方傳統的這個偏見。我把第三個意思譯為“措詞明理(學派)”。

本書分為兩部分，每一部分為四篇。第一部分主要是考證，譬如《鶡冠子》是不是偽書？是甚麼時候寫的？作者是哪一國人？他的思想屬於哪一個學派？原來的古書分為幾卷，包括幾篇？古代學者對於《鶡冠子》的注疏和評價如何？怎麼比較和判斷它的各種版本？等等。

① 見 *Rhetorica*, I, i/1—3.

② 關於這兩個學派別見 IJsseling, Samuel, *Rhetoric and Philosophy in Conflict. An Historical Survey*,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1976 和 Fish, Stanley, “Rhetoric” in *Doing What Comes Naturally. Change, Rhetoric, and the Practice of Theory in Literary and Legal Studie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9, 471—502.

在這一部分裏“措詞明理論”祇是對研究方法有影響。討論任何學者對於《鶡冠子》的看法，我都不會單獨討論其是否以一種客觀的態度，說出對事實的評價，而會同時也研究這個看法的背景和起源。換句話說，每個學者對於《鶡冠子》的判斷都與其自己的期望和價值觀有很密切的關係。譬如說，從柳宗元以來很多古代的學者認為《鶡冠子》是偽書，最重要的原因是因為它的文筆“鄙淺”；現代人對於《鶡冠子》的懷疑可能不是因為文筆，而是因為它的内容有思想方面的矛盾。

雖然在第一部分裏探討對《鶡冠子》的考證的各個方面分得不太清楚，可是簡單地說，我們能把所有的考證問題分為四種（從第二篇到第五篇）：第二篇討論作者的來源和年代；第三篇討論《鶡冠子》的學派和篇章；第四篇主要討論他的文筆和剽竊的問題；第五篇討論最重要的版本的關係。從下面的圖可以比較（1）一般對該書的認識的起源和發展（2）與學者對於《鶡冠子》的批評。

我現在簡單地介紹一下本人對於這四個問題暫時的結論。作者的來源和年代不能分開講。雖然有一些研究者以為鶡冠子是趙國人（因為武靈王所提倡的鶡冠，和趙國的大將龐煖），可是大部分的學者都認為他是楚人（因為“株國”和“令尹”的名稱，他跟楚國其他的著作的共同點，比如《淮南子》、賈誼的《鵬鳥賦》、《國語·越語》、《黃帝四經》等等）。如果《鶡冠子》大部分是秦漢之間寫的一本書，作者的國家可能屬於項羽的領地，不分趙跟楚。

關於作者的年代，一般的研究者都把他放在東周到西漢這個時間之內。如果講仔細一點，我想第一二兩篇是秦二世皇帝的時候寫的（因為避諱“正”和“政”字），從第三到第十九篇是秦漢之間寫的。雖然鶡冠子很明顯地反對秦代或類似的殘忍的政策，他連一次也沒有提到秦或漢代。如果是漢初的一本書，作者一定會很坦率地批評秦代的政策。我想雖然《鶡冠子》一書大部分是秦漢之間寫的，可是有一些部分是被後人插入的（見下）。

	(1)對於古籍的認識	(2)對於《鶡冠子》的批評
第二篇 Biographical Evidence.	周 開始說哪一部著作的作者是誰。比如：《孟子》，《管子》，《韓非子》	明 從宋濂《諸子辨》，胡應麟《四部正訛》以來。
第三篇 Bibliographical Evidence	漢 開始分學派和算篇章。比如：《漢書·藝文志》	明 從胡應麟《四部正訛》以來。
第四篇 Commentarial Evidence	魏晉南北朝 開始專門講文筆(把它與內容分開)。比如：《文賦》，《文心雕龍》	唐 從柳宗元《辯鶡冠子》以來。
第五篇 Textual Evidence	20世紀 ^① 開始追溯原本。比如 H. Roth, <i>The Textual History of the Huai-nan Tzu</i>	20世紀 從葛瑞漢(A. C. Graham), "A Neglected pre-Han Philosophical Text: <i>Ho-kuan-tzu</i> " 以來 ^② 。

第三篇討論《鶡冠子》的學派和篇章。從漢代以來它好像屬於很多不同的學派：道家(《漢書·藝文志》)、兵家權謀(《七畧》)、黃老和刑名(韓愈和陸佃)、道家神仙(《新唐書》)、雜家(《四庫提要》)^③。學派雖

① 雖然我們可以把清朝的考證學者看做他們的源流，可是他們主要是改正錯誤而不是追溯原版。比如：王闕運《題鶡冠子》，俞樾《讀鶡冠子》。

② 還有比他早的一個碩士論文：Williams, Bruce, "Ho-kuan-tzu, Authenticity, Textual History and Analysis, Together with an Annotated Translation of Chapters 1 through 4," Berkeley, 1987, 108—113.

③ 《七略》見《太平御覽》卷六八五，第6頁；《漢書》；卷三十，第1730頁；《韓昌黎集》卷十一，第15頁；《新唐書》卷五九，第1516頁；陸佃《鶡冠子》；《四庫提要》第2455頁。

然很多，可是按照司馬談所形容的“道家”或者“道德家”，它們並沒有什麼大不了的矛盾。別的學者已經建議了，《論六家之要旨》所形容的“道家”大概是黃老而不是老莊的道家。司馬談說道家“因陰陽之大順，採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這就很適當地描寫了《鶡冠子》的內容。

還有另外一個方法來研究《鶡冠子》的不同學派的問題，尤其是道家和兵家。這個方法同時也能解決它的不同的篇章問題。《漢書·藝文志》所載的《鶡冠子》祇有一篇，到了南北朝它已有三卷（《子鈔》）；韓愈所看到的版本有十六篇，而從宋代以來包括陸佃注的版本有十九篇。雖然我們不知道漢代的一篇到底多長，可是從一篇到十九篇是令人懷疑的一種變化。有些研究者提出一個意見，說現在所看到的《鶡冠子》可能是漢代道家的《鶡冠子》和權謀家的《龐煖》兩書合一的結果^①。《漢書·藝文志》縱橫家和權謀都記載《龐煖》書（縱橫家載兩篇，權謀載三篇），而漢代以後沒有人提到它。雖然我想這種看法能幫我們解決以上所提到的兩個問題（學派和篇章），可是它還遺留下不少的問題，而且對於《鶡冠子》的成書年代和它的價值沒有多大的影響。

第四篇是關於文筆和剽竊的問題。雖然劉勰很讚美《鶡冠子》的文筆，說“鶡冠綿綿亟發深言”（《文心雕龍·諸子篇》），可是柳宗元並不同意他的看法。他認為《鶡冠子》一書祇有一小部分值得看，就是從賈誼的《鵬鳥賦》剽竊的那一部分。《鶡冠子·世兵篇》基本上分為兩部分。第二部分和賈誼的《鵬鳥賦》很接近。雖然它們之間的影响是很明顯的，可是問題是：誰影響誰？賈誼用鶡冠子的書還

^① 《漢書·藝文志》兩次錄《龐煖》：(1)兩篇在縱橫家，(2)三篇在權謀。這本古書以後沒有被錄也沒有被看到。

是鵠冠子藉賈誼的賦來表達自己的思想？我想賈誼絕對沒有用鵠冠子的書。雖然《鵠冠子》一書中有《鵠鳥賦》的言辭，可是這不是鵠冠子自己剽竊的，而是後人插入的。為什麼呢？第一個原因是《鵠冠子》原本的年代比《鵠鳥賦》（前 174 年）早。第二個原因是《鵠冠子·世兵》這部分（就是像《鵠鳥賦》的那部分）跟整個《鵠冠子》有不少的不同點。從文筆的角度來說，《鵠冠子》一般沒有那麼長的詩的部分；從詞語的角度來說，像《鵠鳥賦》的部分跟整個《鵠冠子》有一些矛盾。譬如說賈誼的《鵠鳥賦》否定“俗”的概念，把它當做一種粗俗的，必須超越的境界。《鵠冠子·世兵》像它的部分也是這樣。但是《鵠冠子》的原本就不然。他一般來說非常重視“俗”的概念，主張國王要“樹俗立化”^①。除了“俗”字之外《鵠冠子·世兵》（第二部分）跟整個《鵠冠子》還有一些詞語方面的矛盾。如果原來的著者自己用賈誼的賦來表達自己的思想，我想這種矛盾是不會有的。

第一部分最後一篇的目的是改造《鵠冠子》的原本。這方面的考證資料能分為兩種：間接的和直接的資料（indirect and direct evidence）。間接的資料包括所有的在《鵠冠子》道藏版本以前稱引它的注疏和各種書，譬如《文選注》、《路史注》、《藝文類聚》、《太平御覽》、《小學紺珠》、《黃氏日鈔》、《意林》、《羣書治要》、《永樂大典》等等。這種資料，尤其是最後這兩本，證明它們所稱引的《鵠冠子》版本比現在所保留的版本好多了。換句話說，我們現在所有的包

① 肯定“俗”的言論有：《鵠冠子》，子榮，萬有文庫，4：18/6；14：19/4；7：33/9；8：47/3；9：49/2；9：51/7；9：57/6；9：61/7；10：68/7；19：119/7。否定“俗”的言論，除了 12：89/8（像《鵠鳥賦》的部分），還有 12：83/10，18：105/7 和 18：110/2。四個都屬於被懷疑的篇章。

司馬談所形容的“道家”也重視“俗”的概念（《史記》，卷一百三十，第 3289—3292 頁。）

陸佃注的《鶡冠子》版本比這些書常常差了很遠。譬如說按照吳光的看法“元氣”是鶡冠子最重要的概念^①。《鶡冠子》一書祇有一次提到這個概念：第十一篇《泰錄》說：“天地成於元氣，萬物乘於天地”(76/2)。《永樂大典》稱引《泰錄》篇有“天地成於元，萬物乘於天地”(19743:1a5)。我雖然現在不能詳細論說，可是根據我的對比研究，《永樂大典·泰錄》比流傳的《鶡冠子》一書好多了。結論：鶡冠子雖然常常講到“氣”，可是他連一次也沒有提到“元氣”的概念，這個概念反而是陸佃常提到的。

《鶡冠子》的直接資料包括所有保留的整個版本。根據其他學者的研究，最重要的版本是道藏本，四部叢刊本和子彙本。根據葛瑞漢的研究，雖然最早的原本已經沒有了，可是道藏本和四部叢刊本兩個都是分別從那個原本流下來的；它們之間的關係不可能是“父、子”這一類的，而是“兄、弟”這一類的^②。為什麼呢？雖然一般來說道藏本很明顯地比其他的版本好，可是它有時候缺少一些應該有的字。譬如《鶡冠子·度萬篇》的道藏本有：“故佈五正以□五明”。其他版本，包括四部叢刊本和子彙本，都有“故佈五正以司五明”(44/7—8)。既然黃老帛書的《十六經》也有這句，包括“司”字，應該是對的。既然道藏本沒有這個字，“司”字應該是經過另外一個版本從原本來的^③。根據我的初步研究，另外這個版本不可能是四部叢刊本，也不是子彙本，而是子彙本所依靠的另外一個版本。

到了本書第二部分，討論《鶡冠子》的內容，“措詞明理派”的角度就比較明顯了。這部分也分為四篇（從第六篇到第九篇）。第六

① 吳光：《黃老之學通論》，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第158頁。

② 見Graham, 1989, 498, 498, 注4。

③ 見《老子乙本及卷前古佚書》，文物出版社，1974年，十六經，卷三，第23頁。

篇討論鶡冠子的政治背景和他所最關心的題目；第七篇主要講著作的語言作用，尤其是“所謂”這個詞的用法；第八篇討論他對於語言的看法；最後一篇的題目是鶡冠子對於語言以外的世界的看法。這四篇的內容也分得不清楚：它們最重要的共同點是提倡“措詞明理派別”對於“哲學派別”的批評。第二部分的目的可以說是證明哲學派別的角度不是研究《鶡冠子》內容的唯一角度。

在第六篇裏所討論的諸子百家的背景和他們寫書的動機經常跟政治情況有很密切的關係。《鶡冠子》一書，無論是一個人還是幾個人寫的，在這方面都不是例外。它的內容要點是臣主關係，尤其是主對臣的尊敬和主對民的疼愛。關於天、地、道或者一的言論基本上都離不開這個題目。他不討論純粹的大自然而表示作者最關心的政治上的一些問題。雖然鶡冠子的思想基本上都集於這個題目上，可是他根本不表達一種有系統的完全客觀的理論。《鶡冠子》中有不少的矛盾，它的十九篇包括很多零碎的理論、意見、故事和怨言。因為一般的現代學者都不知不覺地從“哲學派別”的角度討論古代中國的諸子百家，他們特別注重系統性和客觀性，極力證明這個古代思想家是一個道地的哲學家^①。我想從這個角度來解釋鶡冠子的思想不是最合適的研究方法。他所缺乏的系統性和客觀性不是《鶡冠子》的問題而是哲學角度的問題。《鶡冠子》的內容中心不是一種理論而是一種關心。

第七篇主要講到《鶡冠子》的語言作用。對於“哲學派別”來說，語言的作用是客觀地描述現實；對於“措詞明理派別”來說，具體的事實，尤其是在政治和道德的範圍裏，必須靠語言纔能存在。

^① 這個情況的一個原因大概也跟西方對於“說服派別”的偏見有關係。現代的大學都有哲學系而沒有說服系。研究諸子百家的學者，無論是在中國還是西方，大部分都屬於哲學系。雖然是這樣，可是兩個派分不清楚。批評這種偏見而提倡“說服派別”的學者當然也是哲學系的。他們的辯論方法和內容也屬於哲學。

上面的人，無論是皇帝，國王，聖人還是父母，他們說“是”對於下面的人就是“是”；他們說“非”就是“非”。“弑”、“誅”、“殺”等字，如果不屬於某一個政治範圍的話，沒有什麼客觀的永遠不變的意思。它們的意思都是根據國王所謂“弑”、“誅”或“殺”的意思而來的。對於《鶡冠子》來說，影響政治的一個方法就是說服國王在這方面所用的名詞。作者不停地強調他所謂“天”、“一”、“道”、“德”、“明”、“聰”、“人”、“兵”、“法”等字。它們基本上都是在政治的範圍裏提出的。

第八篇裏討論《鶡冠子》對於語言的看法。很多西方學者從葛瑞漢以來認為中國古代哲學家對於語言的看法都屬於 Nominalism 的學派而不屬於 Realism 的學派。換句話說中國古代哲學家都把語言看做人造的而不是一種自然而然的客觀世界的反映^①。剛纔所講的作者的語言作用已經說明了他承認人對語言的創造能力和責任。他對於語言所表達的看法也強調這一點：國王所用的詞語對於世界（尤其是政治方面的現實）影響很大。因為一句話在世界上可能有很大的影響，所以國王和臣庶都不可以隨便出言。《鶡冠子》主張國王的任何行動和言論都應該是順從天道的模範。因為他強調這一點，有一些研究者認為《鶡冠子》對於語言的看法屬於 Realism 的學派：語言來自永存的、客觀的大自然^②。雖然這兩個學派都不太適合鶡冠子的思想，可是我同意葛瑞漢的看法，《鶡冠

^① Nominalism 學派和 Realism 學派的衝突很像“說服派別”和“哲學派別”派的衝突。

^② 見 J. Makeham, “Names, Actualities, and the Emergence of Essentialist Theories of Naming in Classical Chinese Thought.”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41.3(1991:342, 注 90) 和 R. Peerenboom, “Heguanzi and Huang-Lao Thought.” *Early China*, 16(1991:184). A. C. Graham, “A Neglected Pre-Han Philosophical Text: *Ho-Kuan-tzu*.”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52.3(1989:514) 不同意他們兩位的看法：他認為《鶡冠子》還屬於 Nominalism 的學派。

子》比較接近 Nominalism 的學派。

最後一篇的題目是《鶡冠子》對於語言以外的世界的看法。因為本書的研究方法，我在第七篇裏從語言的角度來解釋《鶡冠子》關於天道的概念，把它看作君主的模範和言論的標準。可是因為一般的西方學者自然而然地從哲學的角度來研究《鶡冠子》的內容，所以他們一直特別注意作者對於現實的看法，而不怎麼研究他對於語言的看法。語言以外主要是天、道或者天道。這些概念在《鶡冠子》裏是不是跟西方的“Laws of nature”一樣？換句話說鶡冠子所提倡的“法”或“一”像不像牛頓所發現的吸引力規律？這個問題是李約瑟（Joseph Needham）對於鶡冠子感興趣的唯一原因。我在另外一篇文章《關於西方人對鶡冠子的興趣和“Laws of nature”（自然法或自然規律）的普遍性》裏，討論過這個問題。雖然《鶡冠子》的天道和西方的自然法的概念有一點像，可是差別還是很大。《鶡冠子》根本沒有想到李約瑟所尋找的科學革命的因素：即自然法的概念。

雖然我想從“措詞明理藝術”的角度來研究《鶡冠子》有一定好處，能使我們產生新的看法，可是它也絕對不是唯一的研究方法。這個方法當然也有限。請讀者指教^①。

作者簡介：戴卡琳，1961年生，比利時人。比利時魯汶大學漢學系和哲學系畢業。曾經在臺灣大學和美國夏威夷大學讀中國哲學，博士論文：《鶡冠子研究》。現在在魯汶大學漢學系當副教授。著有“*The Pheasant Cap Master (Heguanzi): a Rhetorical Reading*”（SUNY, 1997）。

^① 本文在文字修飾方面得到趙伊露博士和楊民博士的幫助。特此致謝。